

背负旧传统的
“五四人”——苏雪林

黄忠来 杨迎平

苏雪林是五四以后出现的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之一。冰心曾说：“记得五四时代，我们的前辈有袁昌英和陈衡哲先生，与我们同时的有黄庐隐、苏雪林和冯沅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该有苏雪林的一席之地。

苏雪林（1897. 2 ~ 1999. 4），幼名瑞奴，后取名小梅，字雪林，笔名绿漪、灵芬、天婴、杜若、杜芳、野隼、老梅等，其中绿漪用得最多。原籍安徽省太平县岭下村，但她出生在祖父署理浙江省瑞安县县丞之时的衙门里，1913年随同家人返回故乡岭下。苏雪林说自己要算半个浙江人。苏雪林幼年自学，12岁便能做七绝、五古，1919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与庐隐、冯沅君是同窗好友。1921年赴法国里昂进入中法学院学习艺术史，后转入里昂国立艺术学院学习绘画。1925年因母病辍学回国，回国后先后任教苏州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省立安徽大学，1931年到国立武汉大学，在武汉大学执教18年。1949年去香港就职于香港基督教真理会，1950年为研究屈赋再次去法，1952年到台湾任教于台北师范大学，1956年到台南成功大学直至1973年退休，1999年4月，苏雪林以103岁高龄逝世，被人称为中国现代文坛

的“常青树”和“超级老寿星”。

苏雪林集学者、作家、教授于一身，著作甚丰，写有小说、散文、戏剧、诗歌、文艺评论、社会批评、翻译、学术研究专著和各式传记作品共 50 余部近千万字。她终身研究屈赋，是海内外公认的屈赋研究专家，出版屈赋研究系列著作《屈原与九歌》、《天问 正简》、《楚辞新诂》、《屈赋论丛》、《屈赋新探》，仅《屈赋新探》一书就洋洋 180 万字，已卓然成一家之言。苏雪林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成就不能低估。

苏雪林虽然是五四时期作家，并且以“五四人”自诩，但是却背负着深重的旧传统的包袱，这无法摆脱的旧传统和封建思想体现于她的人生观和文学观。

苏雪林曾以“五四人”自命，她也说五四运动使她的心灵整个地卷入那奔腾澎湃的新文化怒潮，她读《新青年》、《新潮》、《星期周刊》，思想起了很大变化。但作为五四人的苏雪林的实际生活行为，却与“五四人”相距甚远。这首先表现在对母亲、对婚姻的态度上，二者相互关联，表现了苏雪林新旧杂糅的复杂的人生观。

苏雪林的母亲 14 岁嫁到苏家。祖母是一位典型的封建家长，贪图享受并虐待媳妇。而她母亲自幼好听忠孝节义的故事，立地要做一个完人，所以，在祖母的高压下养成绝对的服从性，也磨练出无数伺候尊长的才能。自母亲嫁过来，祖母便把她做贴身丫头看待。祖母性极懒，一生就躺在床上过，午餐一下肚，就躺上床，要苏母替她捶背拍膝，直到睡熟为止。晚饭后除捶背拍膝外，还要捻筋，背脊的筋深陷肉里，

要拇、食两指，重重抠下去，才能将筋捻起，要捻得骨笃骨笃地响，自晚饭后捻到三更半夜。所以，苏雪林母亲的右手拇食两指常瘀着血，做紫黑色。又因长期弯腰曲背的用力，她母亲得了腰酸背痛病终生不愈。祖母正餐进食少，但吃零食多，她房间里无论冬夏，总有一只大火桶，盖着灰的小炭火煨着若干小陶罐，罐中是莲子、核桃、百合、薏仁、芡实、燕窝、银耳，燕窝要撮毛，核桃要去膜，莲子要去心，这一切事都是母亲一人承担。另外还要拆旧衣，做鞋袜，搓麻绳。

苏雪林的母亲生她大哥时，祖母恰好也产下四叔，祖母当时只30多岁，乳水并不缺乏，而且当时祖父是县太爷，也雇得起乳母，但祖母见母亲年轻乳浓，一定要母亲喂四叔，而且每次要先将四叔喂饱，才能喂自己的儿子，儿子吃不饱就只好喂薄粥，因饮食失调，消化不良，导致胃病，成年后竟以胃病送终。大哥的死，对母亲打击很大，大悲致病，迁延数年终于不治。她母亲因劳累过度，死时才54岁，而她祖母活到85岁。可以说，苏雪林的母亲和大哥的两条命是在祖母手里断送的。

苏雪林说：“那个时代社会正被一种强大无比的势力笼罩着，压制着，统治着，压得人气也喘不过来。那股势力就是所谓‘旧礼教’。它弥天际地，无所不包，使受之者反抗无从，动弹不得，若非亲自经历过的人，谁能知道，无怪都视为天方夜谭了。”由此可看出苏雪林对旧礼教的痛恨。但是苏雪林对旧礼教、旧传统的态度又是极其暧昧和矛盾的，她虽痛恨祖母的残忍，但她又敬佩母亲的秉性，她说：“有人谓我母亲对祖母之所为，只是愚忠愚孝，不足为训，不知那个时代，忠孝标准原以为‘真’，并不以为‘愚’。譬如胡适博士之母冯太夫人曾割股疗弟病，大军事学家蒋百里也曾割股疗亲病，你能称之为‘愚’吗？一代有一代的道德标准，能出

于至诚之心践履之者便是好人。”苏雪林非常敬佩母亲“忍耐”、“顺从”的德行，所以，在她自己的婚姻大事上，她的态度就是“忍耐”和“顺从”。

苏雪林自幼由父母包办，与商人张余三的次子张宝龄订婚。从订婚到结婚，十几年，两人仅靠通信交往，未见一面。但通过信件来往，苏雪林发现张宝龄是一个极其冷漠的人，苏雪林受旧传统、旧思想的影响，认为既然订了婚，就好好将此婚约保持下去，并企盼在旧婚约里寻到一点真感情，但张宝龄并不圆她的梦，拒她于千里之外。因为张宝龄也是被迫的，对苏雪林并没有感情。面对未婚夫的冷漠，苏雪林也曾希望解除婚约，但一想到受苦一生的母亲，她只有作罢。她说：“夫家的责言，乡党的姍笑，都可以不管，”只是她的母亲，她的严正慈祥的母亲，那能受得住这样打击？苏雪林明知这个婚姻会使她终生不幸，但她却按照母亲的意愿与张宝龄结婚。对待旧传统，她的理解是：“‘父要子死，子不敢不死’虽然不过是句空洞的话，但也是一条不成文的法律。一个诗礼之家，倘使父母真要儿女去死，做儿女的恐怕也只有乖乖儿的献出他的生命。”苏雪林因敬佩母亲的秉性而爱母亲，因爱母亲而牺牲自己。

苏雪林生性是个热情奔放的人，年轻的时候也特别向往纯真美好的爱情。去法国留学之前和去法国留学之时，都发生过被人追求的情形，在法国时，她还真心爱上过一个青年，这个青年也非常爱她，她曾在爱情的旋涡里痛苦挣扎，在自己的心海里进行无人的交战，最后，终于理性战胜了感情，她说：“这是我平生第一个光荣的胜仗，值得我自己颂歌称道于无穷的。”为了母亲，她不能接受别人的爱，也不敢爱别人。她始终告戒自己，她是由家庭订了婚的人，没有另外和别人发生恋爱的可能。在那个反封建的时代，苏雪林是一个

反“反封建”的人。

苏雪林的爱情婚姻观同样表现出她的传统保守的秉性。首先，她认为爱情要有条件，她说：“学问、人格、性情……都是择偶的重要条件。人类的性情是容易迁变的，爱情的变化，尤其厉害，没有条件，单靠空洞的爱情，婚姻的结束，定然危险。”这与五四时期青年人追求无条件的爱是有距离的。她说她之所以不反对家庭代她订的婚约，一方面是不愿伤母亲的心，另一方面则认为未婚夫品学同她相当，无改弦易辙之必要。她将相互爱恋看得很轻，将学问修养等条件看得很重。

第二，主张爱情要贞操，她最恶的是朝三暮四，反复无常的人。她认为：“恋爱，无论肉体和精神，都应当有一种贞操；而精神贞操之重要，更在肉体之上。”她将追求自由恋爱看做与贞操相矛盾的事情，这又与五四青年的恋爱观有距离。

第三，她忌讳离婚。她认为，“离婚过于自由，结合过于浪漫，也有种种的弊端……真正吃亏的都是女人。”苏雪林1923年与张宝龄结婚，到1961年张宝龄因病去世，结婚36年，他们前前后后在一起生活还不到4年，特别是1949年以后，苏雪林在台湾，张宝龄在大陆，十几年未见面，但他们始终未离婚。苏雪林谈其原因：“我是一方面为一种教条所拘束，一方面为我天生甚为浓厚的洁癖所限制。我总觉离婚二字对于女人而言，总是不雅，况那时我已薄有文名，过去受的屈辱已不少，若自己的名字再刊布报纸，让那些好事的记者把我横涂直抹，实觉不是滋味。”^⑩她为了名声，为了面子，宁可孤独寂寞一辈子。当看到别人双双的影儿，也不觉轻轻起了叹喟。她只得一方面以勤奋读书干一番事业来排遣心中的孤寂，一方面制造恋爱的幻影，在她的想象里张宝龄似乎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个是具体的，是“给予她许多

精神痛苦的”；一个是她“理想构造成功的，是抽象的，是她恋爱的幻影”。^⑪她是靠幻影生活着，而幻影又不能真正解除痛苦，正如她说的：“实际上，我是一个人，是一个普通的女性，青年时代也颇向往爱情生活，屡受打击，对爱情倒尽胃口，从此再也不想谈这两个字，把爱情升华为文学创作及学术研究的原动力，倒也是意外的收获。”^⑫

因背负旧传统的包袱，苏雪林饱受婚姻的孤寂和痛苦，她认为，爱情婚姻的不幸能成为文学创作的原动力。笔者以为，背负的旧传统，同样也影响到她的文学创作，使她的创作与同时代的女作家有了较大的差距。

二

苏雪林是一个作家，她创作了小说、散文、戏剧、诗歌，台湾文学界对她的创作成就评价很高，认为“她的声誉之著，学养之深，成就之伟和影响之大，恐怕更要以‘矫然独步’或‘首屈一指’来为她而群相推许的吧。”^⑬她的散文集《绿天》，长篇自传体小说《棘心》，分别于1928、1929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之时，就成为畅销书，由此我们可以将这两本书定为苏雪林的代表作。然而，在这两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苏雪林仍是一个背负旧传统的“五四”人，有人评价：“在苏绿漪笔下所展开的姿态，是刚从封建社会里解放下来，才获得资产阶级的意识，封建势力仍然相当的占有她的伤感主义的女性的姿态。”^⑭自称是“五四人”的苏雪林其实只是获得一些资产阶级的意识，封建的旧传统仍然左右着她的创作。

苏雪林文学作品表现的是“爱”的主题。阿英说：“她的作品所表现的，约略言之，可以分作三方面，一是母亲的爱，二是自然的爱，三是两性的爱。”^⑮

母爱和自然之爱与冰心的创作主题非常接近，特别是对母亲的赞颂，都表达出人类最高尚无私的感情。但如果我们细心比较一下苏雪林与冰心的作品，就会发现，她们所赞颂的内容有很大区别。冰心所歌颂的母亲是一位知书达理的、豁达开明的，能够接受新生事物的女性，而苏雪林所歌颂的母亲则是因循守旧，盲目顺从封建社会的贤妻良母的典范。她不仅将自己束缚在一个封建家庭的小天地里过着悲苦孤寂、忍气吞声的生活。还用包办婚姻来束缚自己的女儿，让她过着同自己一样悲苦而孤寂的生活。幸亏是五四运动使苏雪林走出封建家庭，但旧家庭的封建思想的束缚，仍使苏雪林孤寂终生。

苏雪林却认为她母亲是旧时代贤孝女人的典型，是一代完人，她说她母亲“正是属于那排除物质的障碍，达到精神上完全解放的一类人。她的本质原如一块佳璞，自己又朝斯夕斯，琢蹉磨砢，终则使得那方美玉，莹洁无疵，宝光透露，成为无价之珍。”^⑩这样地赞颂贤孝顺从的女性，正表现出苏雪林思想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就体现在作品中，她在《棘心》中所赞颂的母爱与冰心作品中所赞颂的母爱有着本质的差别，当然也与当时的五四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苏雪林的文学作品的另一主要内容，是表现“异性之爱”，这与五四时期的很多女作家表现的主题是一致的。但这一时期的其他女作家表现的两性之爱，多是写如何冲出封建家庭的束缚，追求自由恋爱的反封建行为。最有代表性的是苏雪林在北京高等师范同班同学冯沅君。冯沅君同样出生在一个封建旧家庭，守旧的家庭将她关在深闺中专事女红，她也是在哥哥的帮助下走出封建家庭的。但她一走出家庭就成为自由飞翔的小鸟，虽然她的家庭一再企图将这小鸟封锁起来与世隔绝，但她宁可牺牲生命，也不愿牺牲意志和自由。

她在《卷蕊》集中，借主人公的口，向世人宣言：“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①7}冯沅君作品的主人公也是爱母亲的，也因为爱母亲而被母亲“隔绝”，但母亲给她安排的人生之路，给她包办的婚姻，她却坚决反对，她打算用死来反抗包办婚姻，她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亲爱的阿母！我去了！我和你永别了！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最景慕的人。少年抚育之恩未报，怎肯就舍你而去？但是我爱你，我也爱我的爱人，我更爱我的意志自由。”^{①8}冯沅君的创作为青年们指出一条反封建的道路，也可以说每一句话都是对苏雪林的劝告和呼唤。

苏雪林作品的主人公对于封建的包办婚姻的态度是妥协服从。苏雪林写异性之爱，“礼教所不允许的爱，她是不肯写的。她只敢在礼教的范围之内，竭力发挥她的天才，抒写她心中的爱。”^{①9}所以，苏雪林笔下的女性，是被旧礼教束缚的女性。当《棘心》的女主人公醒秋被男友秦风撒下的情网笼罩着失去抵抗力时，醒秋理性地以旧礼教约束自己，压抑自己的感情冲动，虽然“理性和感情的冲突，天人的交战，使醒秋陷于痛苦的深渊中，‘寝不安席，食不甘味’”。^{②0}但她终于与她的爱情诀别，当“一层层的狂涛怒浪，要将这一叶小舟卷向情海深处，然而她一点‘孝心’却像一双铁锚般极力将船抓住，不然，早已随波逐流去了”。^{②1}她认为人的性情是不固定的，是要受一点束缚才能不乱走的。她有些甘心让那婚约束缚她自己和他。主人公醒秋说：“假如不是旧婚约羁束着我，像我这样热情奔放的人，早不知上了哪个轻薄儿郎的当。”^{②2}旧礼教似乎对她有功无过了。

封建礼教对苏雪林的束缚，还影响到苏雪林的审美观，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家都以“求真”作为第一审美要求。郁

达夫、郭沫若等男性作家我们就不用说了，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的最大特点就是把自己真实的思想，真实情感表现出来。比如冯沅君，“她的小说所以受到男女青年读者的重视，是因为她有着比同时代的女作家更大的胆量，敢于撕破一切虚伪的面目，把女性的心理和隐秘毫无顾忌的揭露在她的小说之中。”^{②3}同样是苏雪林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庐隐，“她竟敢把男女间的私情，赤裸裸地写出来”。^{②4}并写出自己爱情婚姻痛苦与幸福的真实感情。苏雪林则不同，她在她的散文创作中，并没有表达真实的感情，而是编造出一些虚假的感情。她在新婚时写了一本结婚纪念册《绿天》，《绿天》中写了新婚夫妻的恩爱幸福，苏雪林称之为“美丽的谎言”。^{②5}这里的恩爱，是她编造出来的恩爱，这里的幸福也是编造出来的幸福。苏雪林1925年从法国赶回家乡岭下，与未婚夫张宝龄第一次见面并举行婚礼，张宝龄对她是一副冷淡的神气。婚后，苏雪林发现丈夫张宝龄不但性情冷酷、偏狭，还持大男子主义，不需妻子有才华，只需妻子三从四德，勤俭持家，尽心竭力侍奉他才心满意足。所以婚前婚后，根本无恩爱幸福可言。她丈夫有事赴北京月余，竟半个字也不写给她，她却编写了《鸽儿的通信》十数篇，苏雪林将此称为“童话文学”，是她对爱情的一种憧憬。苏雪林说，在这里，她“把自己美化诗化，也就把周遭人物一个个美化诗化……既如此，则丑陋的变成美丽了，残缺的变成完整了，可憎的变成可爱了，我便陶醉于这如诗如梦的桃色云雾里，觉得很可满足，那不愉快的婚姻对我也就没甚痛苦。”^{②6}

苏雪林那时“善于画梦，渴于求爱，有时且不惜编造美丽的谎言，来欺骗自己，安慰自己”。当然这种欺骗并不能消除终生的痛苦，到老了，她还是认为“自己身世是个缺陷的身世”。^{②7}苏雪林这种虚假的审美观，与五四精神是相背离的。

所以，台湾文艺界评论说：“苏雪林写得最好的是自传。”^{②⑧}因为，自传才是她真实思想、真实情感的体现。

三

谈苏雪林，我们不能回避苏雪林对鲁迅的攻击。苏雪林的“反鲁”始于1936年11月12日写的《与蔡子民先生论鲁迅书》，这封信她曾托人转交给蔡元培，但因其“措辞过于狂直，恐伤蔡先生之意”，而未被转交。次年由苏雪林自己作跋发表于武汉《奔涛》半月刊1卷2期，六天之后的1936年11月18日，苏雪林又写了《与胡适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再次论及鲁迅的心理、人格、个性、道德以及人们对鲁迅的宣传，对鲁迅几近谩骂。胡适于同年12月14日回信，说她所写“尤不成话”，“未免太动火气，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胡适还强调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之作。”这两封信刊于次年《奔涛》半月刊的创刊号上。1956年台湾文星书店出版了苏雪林论鲁迅的论文集《我论鲁迅》。有人称苏雪林是到老还靠骂鲁迅赚稿费的人。笔者认为苏雪林对鲁迅的攻击，并非政治的原因，而是认识问题，她所背负的旧传统使她不能理解鲁迅的价值和伟大。她认为鲁迅“极端偏狭”其实正说明她的“极端偏狭”。鲁迅是反封建的斗士，苏雪林的反“反封建”性必然导致她对鲁迅的不理解，这也正说明她自称的“五四人”只是一个虚名，而并非实质，她与真正的“五四人”相距甚远。

另外，苏雪林的“反鲁”也源于她对当时左翼作家对鲁迅的过分宣传的反感，她认为，左翼作家的宣传鲁迅是一种

“鲁迅宗教”的宣传，是左翼作家在造偶像。

笔者认为，苏雪林的态度是直率而真诚的，绝没有讨好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因素，再说，苏雪林要“取缔鲁迅宗教宣传”²⁹的想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代表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意见。由此也反映了当时左翼作家过分宣传鲁迅的副作用。

我认为，对于苏雪林的“反鲁”，我们的态度应宽容，再不能犯苏雪林“偏狭”的错误。王富仁先生的态度是公正的。王富仁在《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书中说：“苏雪林对鲁迅的攻击极直接而又激烈，同时也显示着她的一种真诚。显而易见，她的这些观点也正是不少同类知识分子的观点，不过她更真诚些，更不顾及自己宽容中庸的道德外表，因而她把同类知识分子的看法公开发表出来，为鲁迅研究提供了许多需要解决的有价值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讲对鲁迅研究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时至今日，她提出的问题还是鲁迅研究者所需要回答的问题，这就是一个证明。”³⁰

苏雪林另一件不能被人们理解的事就是她竟皈依天主教。她曾说：“五四影响我最大的便是‘理性主义’。”陈独秀办的《新青年》关于科学与民主的宗旨影响着她，她一直奉此“理性主义”为其立身行事与治学致思的金科玉律。但她皈依天主教后，她会因为心中有犯难的事而祈祷整整一夜，她说是以她的血和肉，她的整个生命拥抱信仰，“即从那晚起，她的信德忽然巩固起来，不惟对外界敌人，她毫无畏怯，即内在的敌人——那个比外界敌人厉害百倍的——五四唯理主义，也从此敛影戢踪，离她而去了。”³¹但苏雪林皈依天主教，也是充满矛盾痛苦，有过痛苦的思想斗争的，对耶稣基督，她“常觉自己的理性难于容纳”。她皈依天主教，其中有两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一是认识了天主教徒马沙吉女士和海蒙女士，被她们的牺牲精神所打动。二是对婚姻爱情的极度失望，在

无所依托的情况下而皈依天主教。所以说，这是苏雪林的又一次痛苦的选择。

苏雪林的一生是孤寂而不幸的，这个不幸包括婚姻家庭的不幸，文学创作的局限和思想观念的偏狭。而这一切悲剧的产生，源于她的反“反封建”的秉性。也就是说，作为五四人，苏雪林却背着沉重的旧传统的包袱，她自己束缚自己，自己约束自己，这便是苏雪林的局限性。她的局限性源于她的生活环境，她说，她“诞生于旧式家庭中，思想并不解放。”³²祖母的专制和母亲的顺从，从两个方面影响和制约着她。正因为这样，苏雪林在一定程度上，与母亲的思想是相通的，她能够理解母亲的“忍耐”和“服从”，并且赞美这“忍耐”和“服从”，她说：“大家努力做到此点，国家能够存在，家庭能够存在，社会能够存在。”³³而她的这种观念，正是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所批判的封建旧礼教的观念。鲁迅说，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女子本身，何以毫无异言呢？原来‘妇者服也’，理应服事于人。教育固可不必，连开口也都犯法。”³⁴“如此情形，女子便非‘服也’不可。”否则，“国将不国”。³⁵苏雪林的思想与封建旧礼教是如此相似，似乎只要女子“忍耐”“服从”了，“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³⁶

其实，从感情上说，苏雪林对封建社会、封建家庭应该是愤恨的，因为她母亲和大哥的性命都是被封建家庭所吞噬，她的半条命也死在封建的束缚中，她说：“大家庭的制度，片面的伦理道德，她想起来就恨，若不是五四运动，中国不知道还有多少儿女要受这种无谓的牺牲。”³⁷她说五四时期读《新青年》、《新潮》、《星期周刊》，“新青年反对孔子，我那时尚未敢以为然，但所举旧礼教之害，则颇愜我心。想起我母亲一生所受婆婆无理压制之苦及我自己那不愉快的童年，还不由于此吗？”³⁸如此痛恨旧礼教的苏雪林，却时常在言论和行为

上维护旧礼教，苏雪林如此矛盾的态度，足见旧礼教对她影响的深刻。她自己也说，“我诞生于一个极端保守的家庭，虽幼年饱受旧礼教之害，但幼年耳濡目染的力量太强，思想究竟是保守的。”³⁹

环境影响，除了家庭还有学校，她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之前的学校教育，也是旧的教育。苏雪林说：“入了安庆一女师肄业数年，几个国文教师又都是热心卫道之士，所授文字无非宣扬伦常礼教，他们是大冬烘，我们也就成了小冬烘。”⁴⁰

当然，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有着苏雪林同样的环境，为什么很多人走出封建家庭、封建环境，成为反封建的斗士，而苏雪林却陷进深渊不能自拔？这便由各个人的秉性所决定了。苏雪林对于自己的局限和弱点看得清清楚楚，她说：“一个人的思想见解，都有他的渊源，脱不了‘时代’‘环境’的支配。你说某人富于革命精神，对旧的一切都以‘叛徒’，对新的一切都以‘斗士’的姿态出现；某人既不能站在时代的尖端，又不甘拉住时代的尾巴，结果新旧都不彻底，成为人们嘲笑的‘半吊子新学家’，要知道这都与他们过去所处的家庭社会大有关系。”⁴¹苏雪林就是这样的“半吊子新学家”。她正是一个新旧都不彻底的知识分子，对新东西她不乏向往，所以她力争出外读书并出国留学。但她对旧的东西也有依恋，将其当做行事做人的根本，所以她对旧传统有着既爱又恨的心情。这种心情直接影响着她对新思想的接受，她对新思想的关注，开始只是因为好奇，她说：“原在女师授课国学最优长的陈慎登师授课，他终日痛骂陈独秀、胡适之诸人，指为异端邪说，洪水猛兽，因他骂得太激烈，倒引起我的好奇心，想把这类书刊弄来看看，究竟是何种东西。”⁴²这一看，使苏雪林了解了胡适之先生，并深受胡适实证理性的

影响，所以对旧传统，苏雪林虽然也觉得应该推翻者多，但也不愿意像一般的青年那样，“一味抛弃旧的一切，却盲目跟随新的潮流跑，”^{④3}她说，“我倒幸运，虽服膺理性主义，还知选择应走的路。”^{④4}苏雪林自己选择的这应走的路，就是这“半吊子新学家”的道路，对旧的东西不愿彻底抛弃，是有选择的保留。

苏雪林还认为，“五四运动固然给中国文化许多正面的好影响，负面的也不能说没有。”^{④5}所以，对新的东西也是有选择的吸收。她还偏激地将学校的不良风气归于五四运动，如盗窃，男女广交朋友，她认为都是毁灭伦常礼教和固有的风俗人情所造成的。她说：“我个人是个极端守旧家庭出身的，一向矩行规步，幸而并未随波逐流，与她们同化。人家批评我思想很新，行为则旧，是半新半旧，矛盾性人物，也只好由他。我是天生这样个胚子，又能奈何！”她为自己的半新半旧而庆幸。其实，苏雪林不但行为旧，思想也有旧的成分。

苏雪林一辈子生活在矛盾中，并因为种种矛盾而痛苦终身。她爱母亲，但又因为这爱而没有自由，她说：“我有好几次希望母亲早些儿去世，这因为我想获得自由。”^{④6}她并不信天主教，但为了有所依托，却整夜整夜向天主祈祷。对待传统文化和新思想，她更是体现出又爱又恨又怀疑的暧昧态度。她的思想的封建性就是她悲剧的根源。

注 冰心：《人世才人梨花》，《人民日报》，1987年3月7日。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 苏雪林：《苏雪林自传》10页、11页、156页、158页、157页、157页、158页、38页、27页、27页、38页、40页、40页、4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 苏雪林：《棘心》47页、3页、50页、89页、45页、89页、191页、158页、48页、47页、208页、184页、9页、2页、135页、15页、207页，北京燕山1998年版。

①②③④⑤ 陈敬之：《现代文学早期的女作家》103页、95页、95页、103页，

台湾成文出版社，1980年版。

- ⑭⑰ 方英：《绿漪论》《当代中国女作家论》光华书局，1980年版。
- ⑮ 阿英：《苏绿漪小品序》，选自《现代十六家小品》天津古籍书店，1990年版。
- ⑰⑱ 涂女士：《卷菀》4页、3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 ⑲ 苏雪林：《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通信）》，选自《鲁迅档案：人与神》165页，何梦觉编，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
- ⑳ 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7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㉓㉔㉕ 鲁迅：《我之节烈观》，《鲁迅杂文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黄忠来 杨迎平 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 邮编435002]

书讯

朱栋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1917～2000）》出版 由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1917～2000年）》（四卷）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02年7月出版。这套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它配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以新的文学史观、文学观重新遴选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全书编选阵容强大，分别由朱栋霖任主编，张富贵、龙泉明、吴秀明、汪文顶任各分册主编。历经两年，反复遴选，并广泛征求海内外学者的意见。所选作品涉及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诸文体，包括各种风格流派的代表，部分现在看来虽有这样那样瑕疵但在当年却产生重要影响或引发争议的作品，以及港澳台地区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充分体现了经典性和史学价值。另外这套书还有一个不被注意的特点，即在每篇作品之后详细注明出处，体现了很强的版权意识。这在以前的教材中是没有的。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1917～2000）》一出版就受到了广大师生及读者的欢迎，到2002年8月份就已经3次印刷。

（宋桂友）